文化•社会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济日俄战灾述论

池子华

[摘要] 日俄战争爆发后，为"医治战地因战被伤之战国及局外兵民，救护战地之无关战事因战被难人民"，1904 年 3 月 10 日，中、英、法、德、美五国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筹款募捐，添设分会，实施救援。三年中，救护出险、收治伤病、留养资遣、赈济安置总人数达 46•7 万人，谱写出一曲国际人道主义的颂歌。

[关键词]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日俄战争 救援行动

[中图分类号] K257. 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8587 (2005) - 02- 0062- 07

The Relief Eff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Society of Shanghai during the Russo- Japanese War

When the Russo- Japanese War broke out, Chin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America jointly formed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Society of Shanghai on March 10th 1904 to treat wounded soldiers and civilian casualties. This society raised funds, collected donations,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the sub- societies and implemented the relief efforts. Within a three year period the society played a role in the rescue, treatment, recuperation and resettlement of 467, 000 wounded people, composing an ode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ism.

日俄战争爆发后，为救助东北难胞，中、英、法、德、美五国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本文即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助东北战灾行动略加概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1904 年 2 月 8 日，日俄战争爆发。东三省同胞突遭兵燹，"援手无从，呼天莫应"①。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欲救不能，民间善堂无济于事，惟具独立、中立品格的红十字组织始能得到交战双方的认可而予难民以救助。有鉴于此，时任上海记名海关道的著名慈善家沈敦和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奔走联络，终于促成上海万国（"万国"即"国际"之意）红十字会的组建。3 月 10 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工部局举行成立大会，选举产生 45 名董事（其中西董 35 人，华董 10 人），并从 45 名董事中推出 9 名组成办事董事（其中西董 7 人，华董 2 人为沈敦和、施则敬，后增加任锡汾）。这次集会，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经五中立国权宜联合，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②。换句话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即着手日俄之战的救护。要保证救援行动的高效和井然有序

[收稿日期] 2004- 7- 15

[作者简介] 池子华（1961—），男，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 215021

的进行，必须有章可循。为此，万国红十字会的中西董事，经磋商，7月12日制订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这个章程共8条，对万国红会的宗旨、性质、任务、经费、分会等作了原则规定。

关于宗旨、性质及任务，《章程》明确规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五国合办，“专以医治战地因战被伤之战国及局外兵民，救护战地之无关战事因战被难人民”。具有鲜明的中立性。

善款是救援行动的物质保障。《章程》对万国红十字会的经费来源作了说明：“此会经费，以电报、轮船、火车为三大宗，均承北洋核准免费，沪汉火车亦免半费。蒙中国皇上钦奉皇太后慈恩颁帑，又承中西官商输助。”

上海是万国红十字会的大本营，但距离东北遥遥数千里，远水救不了近火。按照国际惯例，红十字会总会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随地添设分会。有鉴于此，《章程》特别规定：“所有附近战地之紧要地方，由总董会议遴延中西绅董，缮给凭信，前往添设分会，办事仍由总董呈请中国钦差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大臣给发该分会华董印札，以专责成而昭慎重。”“各分会或西董主持，华董襄理，或华董主持，西董襄理，皆与上海总董联络一气。”

救助难民脱离险境，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的“重中之重”，因此，《章程》对救护出险办法自然规定得比较详细、具体。水路“现已阻塞”，只好“由难民自行设法出险至烟台，分会查察，近则给资，听其自回原籍，远则给以轮船免票”。至于陆路，“办法最难最多”，主要有：（1）“陆路分会均依傍火车站设立，蒙北洋核准火车免票，发交会董领存应用。与北洋救济公所事同一律，皆察酌难民之实系贫苦一无所有者，方给免票。即以此免票递转至芦汉铁路，照给半票；招商局轮船发给免票，其再转至沪者，验明免票。于换给免票之外，量其归途远近，加给川费，自洋二元起，递至数元不等，以足敷到家、尚略有余为度。其候船宿食之费，仍由本会核实给付”。（2）“轮船火车免票或半票设已用竣，尚未及续领或领而未到，则营口初办时之法，先与站局约明，于每人衣襟手心钤一印记，编数十人为一起，会董亲自护送至停船车之处，帮同船车办事人验明，俾登船车启行。其中如有贫苦不堪者，每人加给洋一二元不等，按日按人详细登簿，以便播告征信。各分会皆依照办理，不使难民有守候饥饿之苦”。（3）“同是被难，而其人向来体面，或随带家眷，尚有行李，但无现钱，或不愿侵占难民免票地步，欲自留体面，则有沟帮子初办时之法，计其车费若干，其人写立借据，由本会如数代给，一面将借据寄交其所指地方，收回归款，或寄交上海本会，听候酌办，总使其出险，而免受窘。各分会亦依照办理”。

红十字会在竭尽救护之责的同时不忘对人的充分尊重。《章程》还特别声明：“救护出险，无论华人西人何国人，均一体相待”，以体现红十字的博爱精神。

当然，对“系恋世业，或已频（濒）于危，又自知他出，仍无可为生者”，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章程》中也“预筹办法数端”：“地方被兵，即多失业，衣食何资，饥寒可悯。中国最重赈荒，况联合英法德美四大国？现已由总董会议广设筹款之法，款集办赈，应随地制宜，总期不出险之无关战事人民，不绝生机”；“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即多疫疠，又非医院之医伤药品所能疗治。现先购运暑药，交各分会酌办，随后再讲求避疫方药，购运济用，俾难民既避流离，同登仁寿”；“战地炮火纷飞，未易过问，战地外及附近处，或有不愿出险、不能出险之人民，既与战事无关，凡有中国地方官之处，均已承中国大（政）府拨款，饬交设法赈抚，本会谊应协助，已切嘱各分会中西会董，因地制宜，带同翻译，与战国将领恳切情商办法，总期不出险之人民，深得安居，再办给赈救疫诸事。”③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为救护行动之南针，它的出台，意义重大。

二

红会之设，“首在筹款”，否则，救援行动无从谈起。《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已载明经费的几大来源。帑银以及轮船、火车

减免票，固然为救护行动提供了有力保障，但“经费浩繁”，“开源”拓宽筹款募捐渠道，势所必然。

3月11日，也就是上海万国红会成立的第二天，施则敬邀集各华董集会于丝业会馆，决定“先行筹备五万金，以期及早开办”[④]。

3月17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办事董事英按察使威金生、工部局总董安特生、律师麦尼而、医生巴伦、李提摩太、沈敦和、施则敬等，聚于英国按察使署议事，除决定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支会”正式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推举沈敦和和李提摩太为书记官、增添任锡汾为办事董事外，中心议题即筹款募捐。“威曰：款项出入，应举一收支人，以专责成，拟请丰裕洋行葛雷君为之。众曰：葛君声望极佳，宜往延订。威曰：汇丰银行于牛庄等处，均设分行，本会银钱，宜托汇丰经理，中外董事以为然否？众曰善。威曰：洋文捐启请麦律师重加润色，启内载明，凡西商捐款，归汇丰代收。”筹款的具体办法，沈敦和“遂将连日华董所办各事八条，对众宣言”，达成共识。此“八条”为：“一、阅西报，知美国檀香山、日本横滨等处，华人捐助俄日恤款甚巨，现创红十字会，其中所救原系华人居多，故拟刊印捐册，请奉命出使美国之伦贝子及副监督黄开甲携往劝募，以期筹集巨款”；“二、驻扎各国钦差及领事，亦均寄捐册，请为劝募”；“三、各省督抚，由吕钦差领衔，电请分别捐助款项，仍由本会各寄捐册”；“四、各省各府善堂，均由本会商请代收捐项”；“五、中国电报局电报能到之处，奉电政大臣允准，凡系红十字会办事公电，概不收费，俟积有成数，即作为捐款”；“六、上海招商局能到各口岸，奉商部参议杨允准，凡系红十字会办事人来往，均给免票，俟积有成数，亦作为捐款”；“七、上海向收善捐之仁济堂、《申报》馆、《新闻报》馆及《中外日报》馆，均请代收捐款，本会在丝业会馆设立总收发所，所有华董办事劝捐等事，即以丝业会馆为总汇之区；八、现由华董先行劝到现银五万五千两，俟收齐后，即存通商银行候拨。”[⑤]募捐办法，具体周详，操作起来，简便易行。

善款由华董、西董分别筹措。华董厥责甚重，不敢有丝毫懈怠。3月29日，吕、盛、吴、沈、施、任联名的“拨助捐款”的通电发往各省后，又在4月2日《申报》登出劝捐启事，言明“经费浩烦（繁），议明中西分筹，并由（吕）海寰等先行筹凑，以上海丝业会馆为华董办事处，公同酌刊捐册，备函分寄各省官绅商富，务恳鼎力提倡，俾被难华人同登衽席，中立主义益明，国势民心两有裨益，不胜祷盼”[⑥]。劝捐呼吁得到各省当局的积极响应，据《申报》报道，截止到5月16日，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广东捐助2万元、盛京将军增祺助银万两、两江总督拨库平银8千两、清江漕运总督3千两、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各万两、河南、陕西各5千两、天津2万两等，捐助之踊跃，可见一斑。

利用大众传媒“广而告之”，可以有效拓宽募捐渠道。在红十字精神的感召下，上海的《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不仅代收捐款，而且利用自身独特的影响，为人道救援呼吁。其如《劝捐万国红十字会经费〈申报〉馆协赈所谨启》，大声疾呼：“俄日兴兵，生灵涂炭，旷日持久，尚无已时。两国受伤之兵，例由泰西红十字会救治。独我东三省黎庶，连天烽火，骨折心惊，去住两难，死生莫卜，昊天不吊，何又降此鞠凶耶！沪上同仁，恻然悯之，商之各国乐善诸君，联为万国红十字会。派人前往战地，救援被难之人，寒则衣之，饥则食之，病则更为之药之。并特赁轮船载之出险。特是事关重大，所费不赀，刻虽集有五万余金，而来日大难，亟须补助。所望寰中义士，海内仁人，各解囊金，拯民水火，较之散财助赈，其功德更无可限量矣！如荷乐施，请交《申报》馆协赈所帐房，自当掣奉收条，以昭凭信。率布寸臆伫盼慈云，敬叩善安，伏维垂鉴。”[⑦]这些新闻媒体的助赈宣传、号召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捐款源源不绝。从《申报》连篇累牍的“捐款清单”中，我们不难想见各界民众涓滴助赈的感人场景。

众擎易举。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踊跃捐输，为救护行动的展开提供了后援支持和物质保障。

三

政府的支持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令人鼓舞，但上海与东北相去遥远，救援行动的实施，只能由分会力任，这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深思远虑的重大事项。因此，红会一经开办，添设分会的计划已在执行中了。7 月 12 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出台时即将“所有附近战地之紧要地方，由总董会议遴延中西绅董，缮给凭信，前往添设分会”的动议揭诸《章程》，“总期广设分会，辗转筹设医伤救难之法，以副中国圣旨，英法德美国同心联合，特行创办之义举”⑧。

牛庄（即营口）分会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添设的第一个分会。日俄战争爆发后，牛庄成为各国在东三省教士的避难之所。当李提摩太应沈敦和之请电询牛庄教士可否助救难民时，得到肯定的答复，“且愿效力者甚众，因此遂有创设红十字会之议”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的第 7 天，即 3 月 17 日，中西董事首次集会，即将在牛庄添设分会的构想提到议事日程：“施（则敬）曰：目前东三省办理此举，自须仰仗西国教士偏劳，惟中国善士愿往者甚多，宜亦派往。西董曰：前往与西教士合力更好。施曰：如不派华人前往同办，恐华人捐款，不能源源踊跃。威（金生）曰：请于牛庄设一分会，亦举中西董事合办。西董即由魏伯诗德，公举华董田贵。华董诸君公举现居牛庄之人，所有在彼一切办法，由彼处分会集议安定，牛庄华董可将办理情形，随时函告上海华董，报知众商，以昭大信。众曰：可。”⑩

4 月 6 日，牛庄分会宣告成立。据报载，这一天“到者甚众，首席为德国副领事彭定耐尔君，次为美国领事密勒君、意司比格而船主白登君并英、美日报馆军务访事人等。议论之下，彼此和衷商定，在牛庄设立万国红十字分会，选举董事十人，刊一捐启，就地募捐，为会中办理善举。董事当经选举六国官商分充，即中、英、美、俄、德、丹是也”。次日，召开董事会，公举美国驻牛庄领事密勒为总董，大理医生管理银钱，英国传教士魏伯诗德司理文案，负责难民救护事宜，“魏君久在营口等处传耶稣教有年，彼处无论何人，均知有魏牧师”[11]。牛庄分会董事分为两股，“以一股专管医院各事，以一股救护难民”，[12] 各司其责。

牛庄分会设立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又遴延候补通判张庆桂（字丹荣）、同知周传诚（字正卿）赴山海关外，添设新民屯、沟帮子分会。不久，周传诚因故回沪，万国红会总董续派直隶候补知县刘芬（字兰阶）、指分直隶候补知州任锡琪（字启文）、云骑尉世职徐信谟（字性模）、朱庆章（字殿卿）、许正寿（字文卿）等，前赴东北，会同西董设立分会医院，并电商密勒、魏伯诗德等，展设辽阳、开原、奉天分会。烟台为水陆要冲，“联络津、沪、旅、青之气”，因请招商局李福全（字载之）设立分会。东海关道何彦升（字秋辇）“就近督率各分会”[13]。此外，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还在铁岭、安暑河、海城、山海关、塘沽、金陵等地添设分会。随着分会的次第添设，大规模的救援行动逐渐推开。

四

4 月 6 日牛庄分会设立后，救援行动开始实施。按照《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之规定，救援行动纲领为“医治战地因战被伤之战国及局外兵民，救护战地之无关战事因战被难人民”[14]。但是，“战地有战场内外之分，战场内惟战国本会得实行其权利，中立国会权利只在战场外”，为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及清廷外务部与日、俄几经交涉，未能获准进入战地。这就决定了救援行动“宗旨只于战场外附近设医院收治伤病军民、救护无关战事人民出险”[15]。

救援行动从牛庄推开。这里切近战地，难民如猬之集。负责实施救护的英国传教士魏伯诗德，假爱尔兰会华医院为牛庄分会总医院，以该院经理白兰德主其事，达立司、西底戈丁、艾德根、阿乃尔、李阿茂、穆伊尔、傅古敦诸西医分担救护之责。医院“药物器械，尽行备妥，一旦开战，可容伤重者五十人，伤轻者一百人。又有医士数人，以备缓急。电音一到，立即可来”。同时，“租有客寓一所，约可容四百余人，以为难民居处，均为之备饮食，

供需求”[16]。

牛庄分会救助难民脱离兵戈之险的“出险”行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牛庄分会开办之始，即张贴告示，“遍告客籍商民，以兵事将临，地方危险，本会谊应救护，请各自酌量，如川资无着者，当由本会酌给并酌备零用，护送出险”。但“众情安土重迁，且海口轮船尚在出入，不无观望”。不出所料，日军进逼，俄军下令封港，“其驻防兵丁，一夕数惊，误将中国民船疑为日军已至，轰放枪炮，商民船户误伤甚多”，人心惶骇，纷纷向牛庄分会求助，“恳照前说，设法出险”。魏伯诗德等“一面电请北洋官绅按照沪会定议赶办车船免票寄下应用，一面因免票尚未寄到，先于各人衣襟下、手掌内各盖一小印，取给洋银，初由西董分起送至车站，与管站人说明，验有此等图记者，不再索车价，陆续载送入关。自此内地得信者络绎而来”[17]，红会工作人员奔忙不息，应接不暇。

牛庄分会的“出险”行动，成绩卓著，到8月初旬，4个月中救护出险并资遣回籍的难民已达4250余人。在整个行动中，牛庄分会共救治伤者26000人，救护出险资遣回籍者20000人[18]。

日俄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之中。5月1日日军强渡鸭绿江，4日第二军在貔子窝登陆，19日第三军在大孤山登陆，26日在金州、南山击败俄军后，长驱直入，进逼辽阳，8月24日拉开辽阳之战的序幕。

随着战线的延伸，难胞与日俱增，红十字的“出险”行动范围因之扩大。辽阳一线，日、俄军事冲突不断加剧，交火中，有三个村子遭殃，屋宇被毁多至400余所，13人死于非命，“其余群至官衙求救”。知州鲜俊英以“战事逼近，恐难民逃入城中者必多”[19]，救护为难，求助于魏伯诗德。但牛庄分会鞭长莫及，力不从心。此时英国医生魏华司德（又译为吴瓦德、魏华诗德、魏司华德）致函魏伯诗德，自请“代办会事”。信中说：“此间善事，凡余力所能逮，无不竭力为之，如蒙尊处委余在辽阳代办万国红十字会及救护难民之事，余亦甚愿受教，以使款不虚糜，民沾实惠云。”魏伯诗德即举荐其为会董，设辽阳分会，“会同知州办理彼处城乡内外救灾之事”[20]。魏华司德在辽阳建有医院，但规模较小，只能容纳50名伤病员，救护出险的难民无法安插。在地方官绅的支持下，魏华司德以红十会的名义“租得大屋一所，设立医院，名曰英华同善会”，议定“（医）院内红十字会用款归吴医士（即魏华司德）给发，招集流亡之款由振款筹给”[21]。英华同善会可收容难民300人[22]。分会添设不久，大战来临，“各处难民闻辽城有红十字会医院兼可保护安全，纷纷迁往，络绎于途”[23]。截止到9月12日，医院治愈伤者300人，英华同善会栖留难民多至千人，而接踵者尚复源源不绝。

辽阳之役，日军伤亡近24000人，俄军伤亡17000人，争战之酷烈，可想而知。而“辽阳之役，华民死者不亚于俄日两军之数”[24]。至于难民之众，不难想见。魏华司德会同地方官绅，竭力施救，“一一布置，有条不紊，遂使全辽人民奔走相告，得庆再生”[25]。

辽阳之战，俄军败北，溃退至奉天一带，奉天民众，惨遭蹂躏，“败兵退至奉天，遍地皆为戍守，田禾践踏之余，又收作军食。民居门窗椽槛一切木料，均被拆为炊具。贫民既受马足踏伤，又受饥饿，种种惨苦，殊堪怜悯”，逃到奉天的“难民不少，终不得安插之所，妇孺蹲踞，几满街巷”[26]。凄苦之状，令人不忍目睹。为救济难民，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添设奉天分会。救护行动的重点于是转移到了奉天。

奉天分会设有医院、栖流所。由于日、俄在这一带展开拉锯战，“奉天难民，均避入城，四乡数百村落，均为瓦砾之场，未毁者被兵丁将人逐去，木料木器，付之一炬，间有携物来城者，然赤手者实居大半。栖流所中，辄达七百余人，妇孺来投者，犹有加无已”[27]。红十字志愿者，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加以救助。

其他分会的救护工作同样出色，如沟帮子分会，在整个救援行动中，给予火车免票救护出险者1128人，给资投亲友者2563人；新民屯分会救护出险者37683人，给资投亲友者23560人[28]，大批在东北从事开矿、筑路、伐木的关内人，由新民屯分会转送至山海关分会资遣回籍，对此《申报》、《大公报》等新闻媒体多有报道。

红十字救护“出险”行动，历时一年有余，131177名身陷险境的落难同胞得以转危为安[29]。

五

“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这是尽人皆知的“规律”。日俄战争之后的赈济，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而言，义不容辞。事实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对灾民的赈济不待“大兵之后”就已经开始了。

日俄战争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吾中立国之民生息于其地者，掷生命数十万，死亡之数，过于(日俄) 两军”[30]。不仅如此，在战争的摧残下，战区“农民失业，商贾裹足，日用昂贵，耕畜、余粮概被搜刮。俄兵每退，于可携带之物外，必焚毁无遗，转瞬饥荒”[31]。战火所及，类皆“荒凉不堪入目”[32]，因此在救护难民“出险”的同时，赈济灾民的行动也在推进中。为此，上海万国红会在沈阳开办了“东三省协赈总局”，以陈艺驻局督办，张琪昌、史纪常为会计，罗相为书记，时敏、陈德球任英、日文翻译，另派叶景葵前往会同商办，“所有赈款、赈粮、棉衣、药物一切要需，统由沪会筹备，运送新民屯，转运至沈(阳)”[33]，调拨各处。各分会设置粥厂(场)，煮粥赈饥。

东北冬来早。10月份开始，即有号寒之苦，难胞衣不完具，受冻挨饿。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接牛庄分会电讯后4日内赶办棉衣5000袭(内计女衣2000袭，童衣3000袭)，而后定做棉衣3万套，陆续运往东北散放，同时在《申报》等报刊发布《劝募东三省战地冬赈款项并棉衣启》、《急募东三省棉衣启》、《红十字会棉衣捐款》，加以劝募。

冬去春来，虽然日俄之战仍在持续，但战地北移，一些地区恢复了平静。浩劫之后，“禾稼尽被践踏，粮种亦复无存，耕具牲畜，付之一空，欲耕不能，”而一旦耕作失时，“冻馁更所难料”，况难民拥挤于栖流所，“易酿时疫”，一旦疫疠突发，后果不堪设想，“尤宜早为遣散”。可是，难民“既无庐舍，复无粮种耕具”，要将难民“遣归田里，及时耕作”，“非给发银两令购器具及粮种不可”。且难民“自播种以至收获，其间青黄不接之时，又非无资可活”。所有这些，红会“不能不预为筹画”。为此，筹拨银四万两，对栖流所留养的难民助以筑室、备耕、生活之费。奉天难民众多，人数超过4万，经与奉天将军增祺协商，由官府资助建房、置办农具，红会赈以粮食，共同安置[34]。

流入城镇的难民需要救济，散布于关东广大农村地区的灾民也不容忽视。据报道，“由营口迤北至沈阳，中间纵约一千余里，横约六百余里，今年未下籽种，秋成颗粒无收。此外各地方类此者多。语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今且不待兵后已有凶年矣”[35]。受灾面积之广，灾民之众，不言而喻。但受灾有轻有重，待赈有缓有急。要高效实施赈济，进行灾情勘查是必要的。魏伯诗德担此重任。10月底，他在取得日本领事签发的护照后，赴岫岩、海城、盖州勘灾，周历60余村，“所经各处，类皆田园寥落，满目荒凉。岫岩之东，熊岳之南，所伤尚轻，而辽阳、盖州殆不堪言。摩天岭至岫岩一带，子粒无收。盖两军在此开战，田禾被伤净尽故也”[36]。为解倒悬，魏伯诗德采取两条应急措施：一请该地将军于被难地方设立官米局数处，以资平粜；二红会承办赈济极贫之户，发放米票，凭票到官米局领米，所需款项由红会清结。

东三省“经日俄之战，所在残破，粒米无收。被难人民，不死于刀兵，仍将填于沟壑，政府恻然忧之”。1905年1月，清政府“电饬南洋大臣转饬本会总董，速拨巨款，多延绅员，迅速驰往，广施赈济”[37]。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即增派史善诒、谢文虎、邓笠航等人前往东北，会同魏伯诗德等办理放赈事宜。日俄战争结束后，放赈持续进行，直到1906年9月始告结束。近两年中，红十会办事人员不辞劳苦，深入到灾区各地，会同地方官绅，散放赈粮，克尽扶危济困之神圣职责。以下是“大兵之后”红会赈济灾民的实录：

承德、兴仁两县，均为旗籍，与新民、辽阳、兴京、海龙接壤。战争中，两军更相驻守，被难尤酷。战后，经史善诒派陈艺、史汝基、张琪昌、谢文虎、任其钧、严良增、张思

永、支昭福、尤辰翼分头前往查明承德县46屯，大口5563名，小口3519名；兴仁县五旗196屯3731户，大口12038名，小口8375名，会同承德知县孟秉彝、兴仁知县崇廉，分别给赈无遗。

辽阳州南界海城、岫岩，东界兴京、凤凰厅，北接承德县，俄军以此为根据地。两军相持既久，为祸惨烈。魏伯诗德与华员刘芬、朱庆章等，前往查明219屯6268户，大口18821名，小口12347名，会同辽阳知州沈金鉴，分别给赈无遗。

新民屯地跨辽河，“名为中立之地，实则仍为两军间道所从出”，“其辽东界内财产牲畜，概遭焚弃”。史善诒派鲁宝清、沈寿庄、林守忠、严良增分头前往，查明17屯477户，大口1079名，小口644名，会同署新民府知府陈衍庶，给赈无遗。

彰武县为蒙古牧民聚居的地方，“本多盗寇，益以兵戈，蒙民困苦，屡求赈抚”。史善诒派谢文虎、任其钧、邹增顺、邓济川等，分头前往，查明97屯1902户，大口4743名，小口4213名，会同彰武知县周士藻给赈无遗。

海城跨辽河为治，接壤辽阳、盖平、岫岩，西为津榆铁路必经之地，东为东清铁路扼要之区，“日俄两军，据以相持，胡匪乘间肆扰，人民困苦殊甚”。西董魏伯诗德、华员朱庆章分头前往，查明130屯3023户，大口7765名，小口5150名，会同海城知县王礼堂给赈无遗。

盖平县东濒大海，西南北三面，接壤海城、复州、岫岩，居民向以种植蜡树，收养野蚕为生计，“自遭兵燹，流亡失业，备极困苦”。西董魏伯诗德、华员朱庆章等，分头前往，查明184屯4252户，大口12138名，小口8817名，会同盖平知县祥德给赈无遗。

开原为日军前敌驻地，土客杂居，流亡四集，鹄面鸠形，嗷嗷待哺。当经史善诒派谢文虎等前往，查明1727户，大口4841名，小口3806名，会同开原县陶应润给赈无遗。

此外，红会还在铁岭、昌图、怀德、奉化、康平、兴京、通化、怀仁、东平、西安、西丰、柳河、海龙、伊通、磐石、沈阳、牛庄、沟帮子、海参崴等地广施赈济。施赈范围共27处，受赈人数达225138人[38]，功勋卓著。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及其分会，救助日俄战灾，历时三载，救护出险、收治伤病、留养资遣、赈济安置总人数达46•7万人，因伤重不治而亡者仅331人。“此次救护工作，得到教会和医院以及中国官方最高的合作，所以成绩特佳。”[39]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红会中西办事各董及救难人员不支薪水，他们以崇高的奉献精神，救死扶伤，扶危济困，默默实践着红十字赋予的人道圣职。

---

①《申报》1904年3月3日。

②③⑤⑧⑨[13][14][16][18][22][26][27][28][29][33][34][36][37][38][39]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第27—30页；第24—25页；第30页；第22页；第30页；第27页；第34页；第41页；第35页；第35—36页；第37页；第42页；第285页；第40—41页；第39页；第37页；第40页；第40—46页；第499页。

④《申报》1904年3月14日。

⑥《电筹救护》，《申报》1904年4月2日。

⑦《申报》1904年4月10日。

⑩《申报》1904年3月21日。

[11][17]《述营口分会情形》，《申报》1904年5月4日。

[12]《万国红十字会牛庄分会来函》，《申报》1904年4月30日。

[15]《续志万国红十字会》，《大公报》1904年4月27日。

[19][20]《朱君礼琦译牛庄万国红十字分会西董魏伯诗德致李提摩太函》，《申报》1904年9月8日。

[21]《万国红十字会来函》，《申报》1904年9月9日。

[23]《述万国红十字会在东三省办理情形》，《申报》1904年9月7日。

[24]《中外日报》1904年11月30日。

[25]《牛庄西董密勒、魏伯诗德致直督袁宫保信朱礼琦译稿》，《申报》1904年10月2日。

[30]《东三省权宜策》，《东方杂志》1904年第9期，第194页。

[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外务部》档第5082卷。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赵尔巽》档第132卷。

[35]《申报》1904年10月13日。